

大国政治的悲剧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解析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在评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基础上,提出了把握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维度,即科学、假说和理念三层面及评判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层面:作者个性—国家性—时代性。着重指出,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的理念层面是把握其本质的关键所在;作为理念方面在国家性的重要体现,米氏理论和其他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一样,是美国例外论的又一展示——国际关系理论是解释美国之外的国家行为的,美国例外——这正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

文章在分析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不足时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演绎律 1) 异化:即理论发展过程中既有不断肯定自我的过程,也有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以获得现时代的合法性; 2) 同化:即各理论从泾渭分明到不断通约,在融合中展示自身特质,获得现时代的合理性; 3) 原教旨化:与任何其他人类思维形式一样,理论一旦形成,都具有原教旨倾向,即不断否定对立面来肯定自身,获得现时代的合目的性,并以此探讨对待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性问题。

关键词: 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国政治、悲剧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2001 年底,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最杰出的学者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新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出版¹,立即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引起了极大反响。该书是作者在“十年磨一剑”的基础上系统阐述其学术思想——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的代表作,是对冷战结束后乐观的自由主义的有力回应,是“继 1979 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后对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理论的最重要贡献……此书论述清晰,极具可读性,是国际关系课程的标准教材”²。

国际关系理论系谱中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国际关系是以国与国关系形式表现的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与国内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内是有政府状态的,而国际社会是缺乏最高权威,处于无政府状态。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逐的基本目标是生存与发展,以国际关系术语讲主要是安全与权力。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学派及其争论首要的即是围绕权力与安全的关系而展开。认为只有争取权力(强权)才能追求到安全(和平)的是经典现实主义(以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代表³),认为各国权力必须受制于集体安全与国际道德的是理想主义(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及至集体安全(世界和平)与国际道德(国际法)以国际(内)制度、国家间相互依赖及国际组织等来体现,理想主义又发展到自由主义阶段,并派生出国际制度和评论(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组织和评论等不同主张(拉塞特《三角和平:民主、相互依赖与国际组织》)⁴。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分歧与争论虽林林总总,但其焦点不是围绕人性—国家性—国际性三个层面展开就是其引申和发挥;人性之善恶、国家是否为国际关系的惟一行为体、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原教旨倾向与修正性企图,是区分这两大流派的根本,并集中归结为权力与道德的矛盾——政治现实主义之父马基雅弗利实现了权力与道德的分离,而自由主义试图结合

之，产生出诸如康德“永久和平”的思想。

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上，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和平可以实现，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战争难以避免，从而展示了两派信念之乐观—悲观的根本分野。

但是，这些都是表象。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人类两大思维理念的根本分歧：现实主义思考的是世界的客观层面——自在世界，以战争状态来理解国际无政府状态。试图洞察国际关系永恒的本质与终结性因素——恰如军事作为确保国家生存的最后手段一样；也因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忽视国内因素，对人设计的各种制度、规则多大程度上能改变历史的必然性根本上持怀疑态度，以历史的长时段出发来审视现实，往往得出悲观的结论。故此，现实主义强调历史的、军事的因素与影响，侧重历史的必然性因素，以历史审视现实。

而自由主义青睐主观层面——人化世界，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和能改变客观世界的终结性力量，以自然（公民）状态来理解国际无政府状态，因此它重视人和制度的作用及历史的偶然性，以未来催生现实。与现实主义思考国际关系的实然不同，自由主义侧重探讨世界的应然层面；与现实主义忧心忡忡于国家间非正常交往方式（战争、冲突）不同，自由主义关注于国家间交往的正常方式——经济、贸易、合作等主题。及至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一般地反作用于客观世界，而是认为国际社会本身由人的观念与社会实践建构而成，自由主义又发展到建构主义阶段（以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为代表⁵）。

奉行权力决定安全的现实主义在与自由主义的不断论战中，自身也在分化，形成不同的分支。其中一支引进国际结构的思想，主张以相对权力追求相对安全，即所谓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为代表⁶）。围绕冷战结束及冷战后世界走向的争论则催生出现实主义的新支流——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以相对权力追求绝对安全，以米尔斯海默 2001 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为代表。

米尔斯海默在书中强调，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⁷

那么，何谓“大国”呢？“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⁸

大国政治为何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因为“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⁹ 所谓“悲剧”，其涵义有二：其一，大国安全竞争是零和博弈——这是悲剧的必然性：“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¹⁰

其二，国家的进攻性企图与权力和生存之间的不恰当紧密结合导致悲剧的恒久性：“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权。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¹¹ 这种悲剧的持久性是以其彻底的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即不管大国的性质如何，都会遵循这种逻辑。

总之，《大国政治的悲剧》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认定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大国的生存意志是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即地区霸权，因而大国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冲突。而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中国会和当年的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主张及时限制中国发展，反对外接触而主张遏制中国。

人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

书中，作者根据“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是什么”、“国家想要多少权力”将现实主义分为人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

人性现实主义，有时又被称作“经典现实主义”。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他在该书中将国家性等同于人性，强调国家的“权力欲望”，认为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力是体系中的“权力意志”。

防御性现实主义又常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主要体现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与摩根索不同，华尔兹并不认为国家内在的侵略性是由于被灌输了权力意志，而在于追求“生存”这一目标，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使其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因为“过多的权力”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联合抗衡。因此，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

围绕冷战结束的争论，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以及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通过集中关注名为“进攻—防御平衡”的结构概念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个案提供支持。他们指出，无论何时，军事力量都被划分为要么偏重进攻要么倾向于防御两类。倘若防御明显强于进攻，征服将变得困难，那么大国就不会萌发用武力攫取权力的动机，而是保护它们已经拥有的权力。当防御占优势时，保护已有的权力就更为容易。相反，倘若进攻更易于得手，国家就非常渴望征服他国，那么体系中出现频繁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不过，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进攻—防御”平衡常常向防御的方向严重倾斜，从而让征服变得极其困难。总之，建立充分的均势加上防御比进攻所具有的自然优势，应该能打消大国寻求侵略战略的念头，而使其成为“防御的倡导者”¹²。

作者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相反它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¹³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主义性质，在他们看来，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正如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国家最初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去作进攻性思考，有时则采取进攻性行动。”¹⁴

追求霸权的国家为什么不担心其他国家会组成均势联盟反对它呢？作者指出：“受威胁的国家常常会采用推卸责任而不是均势战略，因为在战争爆发时，推卸责任者可避免与侵略者打斗的代价。”¹⁵这就突破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本书一再强调，国际体系结构是通过世界是如何组成的五个假设来界定的，包括如下的几点事实基础：（1）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者，处于一个无政府体系中。该体系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2）大国都具备一定的进攻性军事能力。（3）一国无法确定他国是否怀有敌意。（4）大国高度重视生存。（5）国家是理性行为者，能理智而有效地设计使其生存机会最大化的战略。

作者指出，上述五条中的任何单一命题都不能千篇一律地保证大国彼此“应该”采取侵略举动。不过，当五个命题同时具备时，它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畏惧（fear）、自助（self-help）和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¹⁶

第一，大国彼此畏惧。它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对方，担心战争迫在眉睫，国家之间几乎

没有信任的余地……任何大国都认为所有其他大国是潜在的敌人。

畏惧的根源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攻击能力和不信任。当一个国家受到威胁时，没有国家之上的权威机构帮助它，也没有任何方式使侵略者受到惩罚。因此，它们不得不随时为战争做准备。

第二，自助原则。由于政府之上没有政府，因此，国家彼此皆为潜在的敌人，不能依赖别人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必须自己帮助自己。在国际政治中，天助自助之人。自助原则并不排斥国与国之间建立联盟，但是联盟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今天的盟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是明天的盟友。

第三，权力最大化原则。由于惧怕他国，国家必须自助，因此，大国最佳的安全保障就是成为系统中最强的国家，一国越是强于对手，它受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小。国与国之间的实力相差越大，强国受弱国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理想的局面就是成为系统中的霸主。

作者进而总结道：“进攻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叙述性理论。它解释大国过去如何表现以及将来可能怎样行动。但它也是一种指导性理论。国家‘应该’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意旨行事，因为它展现了国家在险恶的世界里求生存的最好办法。”同时他又提醒道，“进攻性现实主义如同黑屋子中的一道耀眼的亮光：即便不能照亮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在大部分时间内它仍是引导人们穿越黑暗的极好工具。”¹⁷

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的阿喀琉斯之踵

如何分析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不足？这涉及到如何对待理论的一般性问题。

首先，在以上论述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演绎律：

- 异化：即理论发展过程中既有不断肯定自我的过程，也有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以获得现时代的合法性。以现实主义发展为例，当人性现实主义发展到结构现实主义时，核心概念就已产生嬗变。比如“权力”，前者强调权力即自身强权（绝对权力），后者强调权力是国家在世界力量中所占据的份额（相对权力）；经典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最大化原则，而防御现实主义则断言过分追求权力只会“自伤”。
- 同化：即各理论从泾渭分明到不断通约，在融合中展示自身特质，获得现时代的合理性。比如防御性现实主义即吸收了自由主义有关共和博弈（安全剩余而非稀缺）的思想，进攻性现实主义也吸收了华尔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结构思想，只不过很好地结合了原教旨式的霍布斯政治现实主义。
- 原教旨化：如前所述，和任何其他人类思维形式一样，理论一旦形成，都具有原教旨倾向，即不断否定对立面来肯定自身，获得现时代的合目的性。¹⁸比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即光大了马基雅弗利与霍布斯政治现实主义的正统。

这样，我们评价理论应该具有发展的眼光，既要注意到该理论作为一般理论的普遍缺陷——由于理论发展的自在要求使得一种理论带有其他理论的一般性问题，又要注意属于理论本身的不足。

作为一般理论的普遍缺陷，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保留并强化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与偏颇，如对国内政治的忽略，静态化地理解国际无政府状态，忽视国际机制、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过分强调国家权力、安全最大化原则，未认识到大国扩张的边际效用原理——“当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收益时，大国便会停止扩张”¹⁹。

如何认识米氏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自身不足，即该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涉及到如何把握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性问题。笔者认为，把握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有三个维度，即科学、假说和理念三层面，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科学性一面，也有假说的一面，同时也是理论倡导者

政治理念的一种自然流露。

作为科学层面的理论，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指出，大国关系最本质和最终结性的因素是激烈的安全竞争乃至战争。正如军事力量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一样，“有关世界如何运作的普遍性理论在决策者辨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和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时起着重要作用”²⁰。进攻性现实主义即是这种具有科学内涵的普遍性理论。但是，本理论从科学层面讲存在的逻辑缺陷，突出表现在理论的实证分析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而一切以历史（主要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为佐证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就更明显了。就算是历史的客观层面，理论提出者还常常因为假说与理念之故而剪裁历史。

米尔斯海默将其进攻性现实主义运用于 1792 至 2000 年间的大国政治史来检验其理论。他对历史记录的解读极大地支持了其理论。但是，“历史学家无疑将挑剔其他一些解释和具有第二手资料的选择”²¹。读者也不难发现，在各章的表格中作者引用的数据来源不一，这些都可能损害其逻辑分析。

更严重的是，米尔斯海默的悲剧式、循环式历史观导致其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而对自己的过分信任，这其中又夹杂着浓重的历史经验——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的影响，尤其是英国、美国经验的循环思维。比如，他认为日本（第六章）和中国（第十章）也和美国一样提出了或将要提出自己的门罗主义版本；基于“光辉孤立”时期的英国经验——扮演欧洲大陆的“离岸平衡手”角色——为永葆美国霸权殚精竭虑。欧洲历史给米尔斯海默启示的又一个例子是，他认为：“岛屿大国不可能发动针对其他大国的征服战争，……最和平的世界可能是：所有大国皆为岛屿国家，并拥有确保生存的核武库。”²² 历史经验的背后是现实主义无视不同国际体系存在的事实，尤其是不了解东方朝贡国际体系的历史；后一事实将表明，即便中国强大了，也不会按照当年的美国经验行事。

世界本是“进攻—防御”一对矛盾体，现实中的进攻—防御因时、因地而异，不应强调其一，而米尔斯海默理论将进攻与防御分裂开来，无疑有回避现实之嫌。事实上，作者在书中也承认：“理论之所以会遇到难以解释的现象，原因在于它们把现实简单化了，只重视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变数。”²³

作为假说层面的理论，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世界作出了许多假定（比如他认为大国在面临威胁时往往采取“推卸责任”而非“抗衡”策略），并得出结论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或许二十年内，几乎可以肯定，当今全球力量结构的巨变将导致大国安全竞争的加剧，甚至爆发大国间战争，最可能的冲突将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因此，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其保守、静态时空观的集中写照。其静态时空观集中体现在对“生存”（survival）、“无政府状态”（anarchy）等核心概念的理解上。我们以他的“生存”概念为例。

在上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五个假设中，第四个是“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在追求其他目标，但安全是其最重要的目标”²⁴。不难发现，作者在这里突然偷换概念，混淆了安全与生存。这种对生存和安全不加区别的运用，确实难以解释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之所以采取进攻态势如发动战争，是因为国家时刻在担心生存问题。那么当对手的行为只对国家造成安全困扰而并未威胁其生存时，它是否一定得发动战争呢？换句话说，衡量一国采取进攻姿态的标准究竟是安全还是生存？

再者，生存是一种感觉，一种大国心态。因此，生存也存在类似马斯洛效应的层次（见本书第二章“国家目标的层级”），包括浓重的非理性因素，这就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心理学等发展提供了空间——或许其中正孕育着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诺贝尔奖？

而其保守性突出表现在，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存在密切相关的两大断层，即陆地—海洋逻辑的断层和美国历史的逻辑断层。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十分强调陆地力量的重要性，认为作为军事权力原动力的人口与财富是衡量大国的主要标准。大国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地区霸权，但不可能形成全球霸

权，原因是越过巨大的水域投送力量十分困难：“巨大的水体使陆军很难进犯一个由武装完备的大国保卫的领土。”²⁵

这样，陆地逻辑形成的进攻性原则与水体阻遏力量之海洋逻辑的结合，使“离岸平衡手”角色成为大国的最佳选择，如此方能超越均势联盟的制约；作者还认为，美国是现代历史上惟一成功获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尽管其他国家为了寻求地区霸权打过许多大仗，如东北亚的日本帝国、欧洲的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等，但没有一个获得成功。取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常常试图阻止其他地区的大国续写它们的业绩。换句话说，地区霸权不需要与之匹敌的对手：“难怪美国这个现代历史上惟一的地区霸权从未考虑过征服欧洲或东北亚。一个大国可以征服它从陆地上能到达的相邻地区，但是绝对不可能获得全球霸权。”²⁶ 笔者曾经指出，这种“离岸平衡手”本身是美国作为“霸权均势”角色的重要体现：从内部看美国，它是“离岸平衡手”，而从外部看则完全相反，让人感到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霸权。²⁷

在作者看来，美国是历史上惟一成功获得地区霸权的国家以及越过巨大水域投送力量十分困难这两个事实，使得美国作为两面靠洋（既非欧洲亦非亚洲）的大国地位永远无法动摇，换句话说，其霸权将永世长存，“因为两个庞大的‘护城河’——大西洋和太平洋——一直把它与世界其他大国分隔开来，因此，美国也许是历史上最安全的大国，”²⁸这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保守性。这样，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避免了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警告的帝国“过度扩张”的灾难，超越了历史上大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钟摆逻辑。

与陆地—海洋逻辑断层密切相关的是美国历史逻辑的断层，即 20 世纪前的美国是进攻性的（扩张）、革命性的；之后是和平维护者，是保守的。因为 20 世纪美国已经完成西部扩张任务，成为两面靠洋的世界性大国，而平衡手的角色是保守的。作者大胆地指出，“在今后的十年内，美国可能会逐步减少在欧洲和东北亚承担的义务。”²⁹ 因为根据平衡手的考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将责任推给其他大国，让后者去抗衡潜在的霸权。但当这种方法失效时，美国使用其军事力量去消除威胁，并在该区域重塑均势以使自己收兵。”³⁰ 故两面靠洋的逻辑是进攻性原则的继续，换句话说，对美国而言，进攻性原则是历史的过渡。

理念层面是把握国际关系理论本质的关键所在。作为理念性层面，该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外交理念，是美国精英意识的某种流露，值得关注；不仅如此，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其他理论一样，带有浓重的美国情结，是美国例外论的现实主义阐述。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大国政治的悲剧还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

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情结

理论的种种不足往往与理论本身折射出的作者个性、国家性与时代性分不开的，因此，笔者提倡以“作者个性——国家性——时代性”三个层面评判理论。从作者个性来说，本书对权力的理解特别亲睐于领土征服与陆地力量，过分强调越过大片水域投送力量的困难。这恐怕与作者的经历有关。作者 1970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在美国空军服役 5 年。如果他是毕业于海军学院，在航空母舰服役，是否还会坚持“越过大片水域投送力量的困难”呢？作者的其他个性，包括其悲剧意识、历史哲学，无疑也对其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作者经历严重影响其理论特色与偏颇的类似局面也可从摩根索、基辛格等人身上找到——作为犹太人的传统悲观思维与二战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两人的现实主义理论观。

在国家性方面，非常有意思的是本书第一章末尾对美国领导人惯于言行不一的现象分析。作者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处是自由主义的，但往往根据现实主义行事，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这就统一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谓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分野的认识。更有启发意义的方面在书中并未挑明，那就是，这一逻辑分裂是美国精神世界的“例外论”思

想在作祟。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有两大不信任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对内不信任政府（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主张“三权分立”，推行自由主义的民主逻辑；对外不信任外部世界——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是现实主义逻辑的天下。因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美国式的社会科学”，³¹ 解释的往往是别国的行为，美国行为一方面遵循和其他国家一样的逻辑，但从精英理念和大众情感上讲美国常常是例外的（尽管作者竭力否认这一点，这正是理论与理念的区别）；这种莫名其妙的例外论往往赋予美国以神圣的使命感、道德感，并以“人道主义干预论”等为其鸣锣开道。比如，书中指出：“冷战期间，美国在联邦德国和日本驻扎部队，尽管它是仁慈的占领者，但它仍不允许这两个盟国建立一个大国所需的军事力量。”³²“它决心保持在西半球的霸权。但是由于越过大片水域投送力量的难度非常大，因此，美国不会在欧洲和东北亚把军事力量用作进攻目的。事实上，美国的盟友主要担心美国军队会调回国内，而不是担心它用这些军队征服他国。美国这种在西半球以外不具称霸动机的现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冷战结束以来没有形成针对美国的均势同盟。”³³

米氏强调，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国家属性是不重要的，不同国家都遵循同一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但事实上，是美国之外的国家不重要，美国是特殊的、例外的（这里的例外当然特指理论折射出的理念而言）。例如，米氏说，“按照现实主义理论，美苏双方都为均势的考虑所驱使，每一方都力图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但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接受这种对冷战的解释，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是受善意所使，而苏联则不然。”³⁴这表明美国式的现实主义在实践中难以超越“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情结。这正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般性地阐释各国的外交政策，而是特别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从大国兴衰论、软权力理论、文明冲突论、大战过时论、民主和平论、单极稳定论……无一不是忧美国所忧、思美国所思，为美国辩护，为其国际行为与战略找“说法”。³⁵ 进攻性现实主义为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寻找逻辑基础的现实举措，正是“中国威胁论”这一自我实现的预言，这是米氏理论时代性的重要体现。

“中国威胁论”是全书各章基于无政府状态与权力分配的实际效果两条线索得出的必然结论。作者在第二章中就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大国的理想局面是成为世界唯一的地区霸权。那一国家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它可以尽情地保护现有的权力分配。今天的美国就处于这种令人垂涎的位置，它支配着西半球，而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霸权。但如果一个地区霸权面对一个可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大国。无疑，它一定会竭尽全力削弱甚至消灭它的远方对手。当然，两个地区霸权都会受到那一逻辑的驱使，它们之间必然发生剧烈的安全竞争。”³⁶

第十章中更明确指出，美国在 21 世纪早期面临的与之匹敌的对手正是崛起的中国。这是作者权力观的必然逻辑。如前所述，作者把人口与财富视为军事权力的原动力，而军事权力决定了一国的外交走向，军事权力中最重要的是陆地力量，即征服领土的军事能力。因此“国际体系中最危险的国家是拥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³⁷ 中国正是这种具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这样，作者推断，基于其人口与规模，以及飞速增长的经济，中国不可避免地具有对国际体系的修正企图。因而在冷战后的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中，容易爆发中美间的激烈安全冲突：“今天，美国对中国越来越感到担忧，不是因为它相对弱小的军事，而是因为中国有十二亿多人口以及快速增长的现代化经济。一旦中国变得特别富裕，它很容易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挑战美国。”³⁸ “在 21 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临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可以想象，中国会针对美国发展自己的门罗主义。正如美国向遥远的大国表明它们不能干涉西半球，中国也将表明美国介入亚洲是不可接受的。”³⁹ 作者甚至危言耸听地说，“美国可能在朝鲜和台湾两个问题上都陷入对中国的战争”。⁴⁰

作者不无忧虑地写道：“这种未来的中国威胁最令人头痛的一点是，中国将比 20 世纪美

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霸权国更强大、更危险。”“这一分析表明，中国今后经济发展大大放慢对美国很有利。但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推行的是起相反作用的战略。美国是在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⁵⁴“这种对华政策被误导了。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使其生存几率最大化的最好方法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尽管中国肯定希望成为东北亚的霸主，美国却明显不愿意让这种情况发生。”⁵⁵

由是观之，米氏的中国威胁观与其他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有两点不同：其一，威胁原因不同。米氏认为中国威胁是大国以相对权力追求绝对安全这一进攻性现实主义通则的必然结论，是国家生存意志使然，这与中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或领导人意志等无关。其二，威胁内涵不同。米氏并不象历史现实主义那样将中国类比于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不满足国际体系现状而挑战之，而是从一种历史的、悲剧式循环的角度看待中美冲突，认定中国威胁乃大国政治自身逻辑演绎的必然。任何其他强国崛起都会形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形成冲突。中国威胁的不是国际体系，而是美国霸权。

“9·11”事件分散了美国提防中国的注意力，非对称性威胁促使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但并没有改变其基于能力而非意图的传统大国政治思维。“9·11”事件本身给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带来了一重大反思——如何对待美国力量？这一主题尤其在约瑟夫·奈于“9·11”后推出的《美国力量的悖论》一书中得到很好的阐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国霸权是一双刃剑”⁵⁶。

另一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也撰文戳穿了“9·11”后一切都改变了”的流行谎言。他指出：“离岸平衡手战略（offshore balancing strategy）是一个取代优势（primacy）战略的大战略。……它基于责任转移而非责任分享的原则。”这一战略承认美国不能阻止新大国的崛起，不管是在其影响域内（欧盟、德国、日本），还是域外（中国、复兴的俄罗斯）。他主张减免美国在动荡区域如海湾/中东、东南欧的安全责任，让日本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反对美国扮演全球霸权的角色，避免激怒欧洲、俄罗斯、中国。惟其如此，方能避免落入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霸权国命运。“进攻性现实主义预言，美国试图维持霸权是自我拆台（self-defeating）的行为，因为这将诱发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导致美国相对力量的无谓消耗，比遵从多极化格局更糟。”⁵⁷ 莱恩的思想与米尔斯海默如出一辙。因此，“离岸平衡手战略可以描述为推卸责任与均势战略的结合”；⁵⁸ 进攻性现实主义并非全球主义或扩张主义，而是保守主义，它主张美国抽身。这就排除了“新帝国论”等误导美国到处树敌的做法，确保美国霸权永世长存。

为美国度身定做的“离岸平衡手战略”与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棋局”战略有异曲同工之趣，分别代表了海洋与陆地两种版本的霸权均势战略。因而米氏提出“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一耸人听闻的逻辑，目的在于“为永葆美国强权开药方”。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the Trage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ANG Yi-wei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offensive realism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dimensions of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theory: science-hypothesis-ideas and three levels of evalua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onality-nationality-character of the times, arguing that the dimension of ideas is the key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s the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ideas in nationality, Mearsheimer’s theory, like other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s another revelation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what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xplains are behaviors of other countries except the U.S.---this is the trage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y analyzing the deficiencies of offensive realism, this paper advances three evaluating laws: 1) alienation, i.e., during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IR theory, there is both self-affirmation and self-negation to gain its contemporary legitimacy; 2) assimilation: i.e., IR theory evolves from entirely different to continuous conjunction, showing its characteristics when harmonizing with others to gain its contemporary rationality; 3) fundamentalisation: like any other kinds of thinking, when IR theory has come into being, it gets the trend of fundamentalization, i.e., affirm itself by negating the opposites to gain its contemporary teleonomic.

Key words: Offensive realism; tragedy;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收稿日期: 2003-07-01;

作者简介: 王义桅(1971-), 男, 江西瑞昌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 国际关系学博士。

¹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² Sean M. Lynn-Jones, “Book Reviews o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2, April 2002.

³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67).

⁴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⁵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⁶ Kenneth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⁷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5.

⁸ *Ibid*, p. 5.

⁹ *Ibid*, p. 164.

¹⁰ *Ibid*, p. 2.

¹¹ *Ibid*.

¹² *Ibid*, pp. 20-21.

¹³ *Ibid*, p. 21.

¹⁴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994/95, pp. 5-49.

¹⁵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139.

¹⁶ *Ibid*, p. 32.

¹⁷ *Ibid*, p. 11.

¹⁸ “合目的性”借助了康德历史哲学的提法:“构成康德历史哲学的中心线索的是历史的两重性,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亦即人类的历史在两重意义上是有道理(理性)可以阐释的:(一)它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类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二)它同时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可的目标前进的。就其当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目的的;就其实际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规律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译序)。

¹⁹ 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Summer 2002), p. 172.

²⁰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9-10.

-
- ²¹ Lynn-Jones, op.cit.
- ²²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137.
- ²³ Ibid , p. 10.
- ²⁴ Ibid , p. 31.
- ²⁵ Ibid, p. 128.
- ²⁶ Ibid , p. 140.
- ²⁷ 参见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J]. 《美国研究》2000 年第 1 期。
- ²⁸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127.
- ²⁹ Ibid, p. 41.
- ³⁰ Ibid, p. 237.
- ³¹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77)”, *Daedalus*, 106 (3) (Summer), pp.41-60.
- ³²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79.
- ³³ Ibid p. 382.
- ³⁴ Ibid, p. 24.
- ³⁵ 参见王义桅:《在科学与艺术之间: 质疑国际关系理论》[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9 期。
- ³⁶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42.
- ³⁷ Ibid, p. 135.
- ³⁸ Ibid, p. 56.
- ³⁹ Ibid.,p.401.
- ⁴⁰ Ibid. p. 375.
- ⁵⁴ 在 2002 年 4 月 8 号接受采访和对话时, 米尔斯海默更是明确提出联合日本、越南、韩国、印度、俄罗斯共同遏制中国的观点, 参见
<http://globetrotter.berkeley.edu/people2/Mearsheimer/mearsheimer-con6.html>.
- ⁵⁵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401-402.
- ⁵⁶ Christopher Layne, “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2.
- ⁵⁷ Ibid.
- ⁵⁸ 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Summer 2002), p. 164.